



安徽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理学与文学论集

廖可斌◎著

Li Xue Yu Wen Xue Lun Ji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理学与文学论集

Li Xue Yu Wen Xue Lun Ji

廖可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学与文学论集 / 廖可斌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6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ISBN 978-7-5060-8275-4

I. ①理… II. ①廖… III. ①理学—研究 IV. 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3461号

理学与文学论集

(LIXUE YU WENXUE LUNJI)

作 者: 廖可斌

责任编辑: 杨英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7月第1 版

印 次: 2015 年7月第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275-4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本书获得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课题出版资助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
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张怀承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朱汉民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借为这个文库作“总序”的机会，我想讨论一下这样几个问题：现代世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传统国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国学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一）国学的意义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作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

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 21 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

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化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 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 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构架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存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能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

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的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建立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

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

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

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

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

自序

本书收入文章 23 篇，全部在有关报刊和书籍中发表过。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理学与儒学”，主要以理学为聚焦点，探讨理学和儒学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二是“理学与文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察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的理学（心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三是“理学与文化”，由对理学的探讨延伸到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因当代人对理学的看法，牵涉到对整个儒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又影响到我们现在对提升人文精神、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思路和策略的选择。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学。宋代以后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许多文学家同时也是理学家，另外一些文学家即使算不上是理学家，也都生活在理学已成为基本知识体系和普泛意识形态的社会生活环境里，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或正面或反面但更多情况下是两者兼具错综交织的影响，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对此予以表现和回应。要准确理解这一时期文学的精神内涵，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流变，而不注意文学与理学的关系这一维度的考察，是绝不可能的，尽管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维度。

基于这一认识，我早期撰写的一些文章，如《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中唐文学发展动向》等，即已比较注重从文学与理学的关系，来观察和解释一些文学史现象。但我直接思考理学本身的基本性质，是从写《理学的两面》开始的，这是为我的老师马积高先生的著作《宋明理学与

文学》写的书评。该文确立了我此后探讨理学的性质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的基本思路，因此虽然它篇幅很短，我还是将它收入本书。我的基本思路，就是着重探讨理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二重性质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即对理学的性质和作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也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力求将理学置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思想史背景，对它的复杂性作出一种逻辑解释；而尽可能深入地揭示和解释历史现象的复杂性，我认为正是学术研究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和争取达到的境界。在此后撰写的《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万历为文学盛世说》等文章中，我对上述思路稍作了一些演绎和展开。

2002年9月至2003年7月，我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任社长杜维明先生一直倡导儒学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受他的启发，也因为当时有比较闲暇的时间，我对理学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意识到我们如果继续按照流行的探讨思想与历史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即所谓作用与反作用模式，我们就很难跳出或肯定或否定或一分为二这样一种分析和评价的套路。我们要对理学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必须首先对探讨思想与历史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进行反思和创新。为此我提出，探讨思想与历史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有三种理论模式，即作用与反作用模式、互动模式和互塑模式，而互塑模式更符合思想史的实际情形。根据互塑模式，任何思想实际上存在三种形态，即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应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自然会形成其基本宗旨和理论体系，这就是它的基本形态。但理论一进入社会现实，就会被现实重新塑造；它在被现实重新塑造的同时，又在塑造现实。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始终处在这种互相塑造的动态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的思想，即处于社会现实中的思想，就是思想的现实形态，它已经不可能是原来的基本形态了。它发挥的作用，也与其基本形态的原有指向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可能走到反

面。但正因为思想与现实是互塑的，如果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思想的形态也就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发挥其潜在的作用或新的作用，这就是思想的可能形态。近代以来侧重否定理学以至整个儒学的人，实际上是侧重观察其现实形态，而没有注意到它的可能形态；而侧重肯定理学以至整个儒学的人，实际上是侧重发掘其可能形态，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回避了其现实形态。根据互塑模式和三种形态的思路，这些都可能纳入一个整体框架内。理学以至整个儒学的基本性质、历史作用和潜在价值、当代意义等，都可以得到一种逻辑的解释。根据上述认识，我撰写了《思想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探讨理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可能性的一种思路》一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对理学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的思考的一个小结。稍微夸张一点说，所谓互塑模式和思想的三种形态，是力图提出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理论模型。但我也清楚，对思想史研究我是外行，这很可能只是无知者无畏的一种表现。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的风尚发生明显转变，一是从特别强调经济发展，到开始注重文化建设和人文素质的提升；二是从侧重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到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形成了所谓“文化热”和“传统文化热”。我受这种潮流挟裹，应邀在“浙江人文大讲堂”等场合做了一些演讲，演讲之前总要有所准备，这就促使自己对相关问题做了一些思考。2005年发表的演讲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有多深》提出了近代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误解的问题，其中重点谈到了对理学及儒学的误解。当时面对大众明确这样提的还不多，因此该文在网上转载和点击比较多，也算产生了一定影响。2011年，《炎黄春秋》杂志为响应当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起“文化体制改革笔谈”，我应邀写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短文，提出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有极强的延续性，发展文化不能

根据某种现实需要人为地随意切割拼接。中国古代文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取资的资源之一，而应该是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它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不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而是主流的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必须立足于这个基础。从2014年起，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原来没有过的提法，表明中央层面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建设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我为之感到欣喜。

“附录”收入两篇我怀念老师的文章。马积高先生一直强调研究古代文学要关注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关系。他除撰写过《赋史》、主编《历代辞赋总汇》、《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外，还撰写了《荀学源流》、《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等著作。如前所述，探讨宋元明清文学可以有多个维度，我之所以偏重文学与理学的关系这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马积高先生引导的结果。饮水思源，留此鸿爪，以示渊源所自。怀念徐朔方先生的文章，探讨了人文学者与公众的关系，实际上是思考高端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社会文化建设的作用，也与本书的内容有关。

出版一本书，价值可能体现在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就我本人而言，写下这些文字时，都做过一些思索，费了一些心血，现在结集出版，留作纪念，自然是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而对读者能否还有一点益处，则我不敢确定。因此此前曾有一些结集出版的机会，我都犹豫而止。但这次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慨允将本书列入《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出版，我几乎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我想这是因为岳麓书院的热情邀请，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愫。从1978年初到1987年初，我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大学）前后学习、工作了九年，经常和同学、同事们在晚餐后散步，要么走到湘江边上，江风吹襟，眺望橘子洲头；要么走进隔壁的湖南大学，沐浴着晚霞，徘徊在岳麓书院和爱晚亭畔，那是多么